

韩国学丛书

韓國學論文集

2004

第十二辑

杨通方教授从事韩国学研究五十年专辑

北京大学韩国学研究中心 编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K312
2

韩国学丛书

韩国学论文集

2004

限期还书卡

2006.12.25	2006.12.25

专辑

北京大学出版社
北京

© 2004 本辑由韩国明知大学支援刊行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韩国学论文集·第十二辑/北京大学韩国学研究中心编.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4.5

(韩国学丛书)

ISBN 7-301-07440-9

I. 韩… II. 北… III. 韩国—研究—文集 IV. K312.607-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41766 号

书 名: 韩国学论文集·第十二辑

著作责任者: 北京大学韩国学研究中心 编

责任编辑: 张 娜

标准书号: ISBN 7-301-07440-9/G·1235

出版者: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北京大学校内 100871

网 址: <http://cbs.pku.edu.cn> 电子信箱: zpup@pup.pku.edu.cn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65014

排版者: 兴盛达打字服务社 82715400

印刷者: 北京大学印刷厂

发 行 者: 北京大学出版社

787 毫米×1092 毫米 16 开本 16.75 印张 350 千字

2004 年 5 月第 1 版 2004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2.00 元

《韩国学丛书》编辑委员会

主 编：杨通方

副主编：葛振家 徐永燮 宋成有

编 委：（按姓氏笔画）

尹保云 巫宁耕 宋成有

沈定昌 严绍璁 杨通方

徐永燮 徐 凯 韩振乾

葛振家 魏常海

通方與子兄摯友半華詠誌禧

德業遠文教
智迪後進

癸未隆冬北京大學陳玉龍
撰書於蘇園三苑堂



目 录

成功的人生	金俊烨 (1)
一片赤诚的学术探索	白 锐 (3)
沧桑历练,老当益壮	夏应元 (6)
热泪映丹心	何芳川 (8)
良师启蒙终生受益	宣德五 (9)
七律·贺词	任桂淳 (12)
我国韩国学的铺路人	葛振家 (13)
为中韩文化交流事业呕心沥血	沈仪琳 (16)
韩国学家杨通方教授学术传略	徐 凯 常越男 (19)
《皇华集》——中朝文化交往的历史见证	曹婷婷 (25)
丙子朝鲜通信使与近世日朝通交体制	陈文寿 (41)
“丙子胡乱”与朝鲜“还乡女”	全信子 (58)
简论朴趾源写景散文的艺术特色	李 岩 (66)
“松都三绝”新解	张 敏 (71)
华夷观与朝鲜后期的小中华意识	王元周 (79)
1882—1884 年袁世凯对朝交涉中的得失与影响	李德征 李劲军 (96)
1896 年闵泳焕使俄与东北亚国际关系	福田忠之 (108)
甲午战争后韩末改革的外力介入与韩国君臣的对应 ——以光武改革为中心	宋成有 (139)
论韩国义士安重根与中国关系	石源华 (164)
21 世纪东北亚和平与发展	郑钟旭 (173)
韩国民主化的长征历程:中断与持续	金甲喆 (178)
朝鲜核问题的由来与发展	刘金质 (183)
试析 20 世纪 50 年代中后期日韩关系出现松动和变化的原因	安成日 (200)
朴正熙外交政策对韩国经济发展的影响	沈定昌 (210)

东北亚地缘政治与中美对朝鲜半岛的政策	李元烨 (220)
布什政府的外交安全保障政策与解决朝鲜核问题的六方会谈	李锡遇 (231)
韩国企业经营体制论析	陈龙山 (239)
第二次教育立国战略:韩国“BK21”计划	杨金成 (247)
迈向和平繁荣的东北亚时代 ——对东北亚安全合作的几点思考	白 洁 (253)
编后语	宋成有 (256)

成功的人生

金俊烨

每当提及我缘何喜欢并且尊敬中国人的时候,我常要强调,这是因为中国人讲信义、勤劳、谦虚,有极强的灿烂文化创造力、有宽阔的胸襟,能包容并有条不紊的处理每一件事情,以及具有能忍耐的平和性格的缘故。这是我一生与很多中国人交往过程中得出并确信不疑的想法,我认为杨通方教授正是一位很好的代表。1944年,在徐州附近,我从日寇那里逃脱,参加了中国游击队,后与韩治隆队长等很多中国人一起抗日,因此开始对中国人有了较深入的了解。在六千里的长征中,在重庆韩国临时政府以及参加西安韩国光复军时,认识了许多中国人。特别是二次大战后,在中国国立东方语专执教的时候,认识了姚南校长、张礼千教务主任和很多学生。在中国中央大学(现在的南京大学)的研究生院学习的时候,也结识了很多朋友,在台湾大学认识的师生以及1988年以后每年3到4次访问中国时结识的很多中国学者,我的结论正是由此而得来的。

在与如下诸位朋友的亲密交往过程中,我更进一步坚定了对于中国人的认知。他们是在中国东方语专一起执教过的北京大学的陈玉龙和陈炎教授,通过杨通方教授介绍结识的季羨林、周一良、王学珍、李滔教授,以及吴树青、郝斌、何芳川、迟惠生、徐凯、宋成有、刘金质、韩振乾、葛振家、徐万民、沈定昌、尹保云教授及北京大学历史系的诸位教授,社会科学院的汝信、沈仪琳、宣德五、赵习教授,以及北京语言文化大学的许维翰教授、辽宁大学的冯玉忠校长和出色完成第一任驻韩大使任务的张庭延先生。人们常说想要了解一个人,可以通过了解其朋友的方式了解他本人。杨教授介绍的学者们不仅学识渊博,而且都谦虚、平易近人,是胸襟坦荡、德高望重的贤德之士,能够与他们相识,我感到无比的高兴。

我和杨通方教授的深厚情谊始于1946年2月,当时我在东方语专韩语科担任讲师。时至今日,已有58个年头了,此间我们亲密的相处之事实已不仅在韩国而且在中国学术界里广泛流传。详情杨教授已经记述多次(例如,1996年北京大学韩国研究中心出版的《金俊烨先生致力韩中文化与学术交流五十年专辑》中刊载的杨教授的文章《师从金俊烨先生50年》),在此不再赘述。

在重庆和南京的东方语专的时候,杨教授在汉城大学留学的时候,两国未建交的36余年的空白后,1986年与杨教授在美国洛杉矶再度重逢,1988年我出访北京时的再度重逢,1991年为促进韩国学的发展,与杨教授通力合作在北京大学创建韩国研究所,这些都是我与杨教授之间珍贵的回忆。

但是,听说中国文化大革命时期杨教授因为到汉城留过学而陷入困境,我感到十

分的难过,因为我正是当初建议杨教授到汉城留学的“罪魁祸首”。

杨教授听从我的建议,到汉城大学学习历史。师从当时韩国历史学界泰斗李丙寿教授。李教授亲切而严格的指导对其学问的形成产生巨大的影响。杨教授一生致力于韩国史的研究,出版了很多著作。并成为今日中韩两国学界的泰斗,为此我感到十分的高兴。特别是在北京大学创办韩国学研究所以后,杨教授更与我一道竭力促进中国其它高校韩国学研究所的发展。他不仅已成为韩国学研究的大家,而且为韩中两国的友谊倾注了心血。

尽管我这一生都致力于海外韩国学的发展,但是在中国如果没有杨教授的积极支持也不会取得今天这样的成果。

尽管我与杨教授之间有着长久的情谊,但倘若不是与杨教授在学术界通力合作的话,感情恐怕也不会如此深厚;倘若杨教授不是执教于中国最高学府——北京大学的话,同样也不会取得今天这样大的成果。

如同古语所说“与人共事,方知此人之真本事”。我与杨教授在中国共同为韩国学的发展而努力工作的过程中,更进一步感到杨教授的学问之渊博,人品之高尚,能力之强。这是我的坦率直言。历史是人创造的,杨教授担负着在中国发展韩国学以及增进韩中两国友谊的历史使命。如果说我对于韩中友谊所做的一点点事情被称为功劳的话,那么杨教授才是真正的有功之臣。

1946年2月我与杨教授初次相识的时候,我26岁,杨教授22岁。岁月流逝,今天已为杨教授庆祝80大寿了。如今80岁大寿,相当于过去的60寿辰。随着医学的发展,今天人类可以活到125岁。因此,我真诚地祝愿杨教授健康长寿。长寿意味着能够做出更多的业绩。

杨教授业已做出了卓越的贡献,所以我相信杨教授在未来的日子里无论是在学术界、教育界还是在韩中两国友谊方面,都必将作出更大的贡献。

杨教授的一生是人生成功的真实写照。

2004年2月15日于韩国汉城

(作者为韩国社会科学院理事长)

一片赤诚的学术探索

白 锐

在祖国大地掀起翻天覆地的变化,社会主义经济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我国在世界上的地位显著提高,社会、科学、教育不断以崭新的面貌发展的今天,我们为杨通方学长祝贺他的八十华诞,感到由衷的高兴。

杨通方学长是我国早期留学韩国的一位学有成就的留学人员,他就读于韩国著名大学汉城大学,攻读朝鲜史学。在他青年时期就怀着为祖国服务的远大理想,随着当时在华任教、现为韩国社会科学院理事长的韩国著名学者金俊烨博士远赴汉城深造。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他认为在异国他乡终究不是归宿,当时,又逢新中国成立,深深打动着一位青年学子的心,于是,杨先生在战火烽飞下冒着极大危险,抱着为新中国服务的决心,毅然离开韩国踏上祖国的土地。

杨先生任教北大东语系朝鲜语教研室,当时我正值学生时代,在学时期我也受到杨先生的教诲。后来,我从北大东语系朝鲜语专业毕业后留校,继朝鲜来华执教的柳烈教授担任了北大朝鲜语教研室主任的工作,从此与杨通方学长同在一个单位工作。70年代末期,因工作需要我虽然离开教学岗位,但与杨先生却始终没有中断联系。90年代我退下之后,杨先生担任北大韩国学研究中心主任时,我又应聘在该中心作研究工作。因此,我们之间的同业交往和友谊往来整整延续了半个世纪。

杨先生给我留下最深刻的印象是很难用简短的文字或话语表达的。他学成回国在特殊的环境下,遇到坎坷不平的此事彼事。但是,最为可贵的是他能正确对待事态,一颗报效祖国的赤诚的心从不动摇。在我们长期共事期间,他为在我国建立一个研究朝鲜语的基地,始终是以百倍的热情对待工作。他主张语言是交流的手段,是我国与外国开展外交往来不可缺少的工具,因此培养外语人才是我们的首要任务。杨先生以他精深的韩国语和汉语修养,为学生开设了翻译课程,不仅如此,他还强调只注重语言教学是不完全的,全面的培养人才应是让我们的学生了解外国的历史、文学、政治、经济。正是在杨先生的正确建议下,朝鲜语专业设立了朝鲜概况、历史等方面的课程,并且由他亲自给学生长期授课,使学生受益匪浅。他与其他老师共同培养的学生,日后有的成为著名学者教授,有的成为我国驻外大使等各级外交官,还有的成为部队的将领,不愧是桃李满天下。解放后在北大东语系始创朝鲜语专业,因此基础差、底子薄,这就需要一大批奋勇开拓者。我们在工作中提出编写《朝汉词典》、《汉朝词典》以满足教学的需要,杨先生力主办好此事,并且投入了巨大的力量,花费了许多心血,历经数年与其他同事共同完成了编写工作。数百万字的巨著为我国学子掌握这一陌生的语言,开展政治、经济、外交、科教以及各项研究工作提供了必

要的帮助。

“学成归国,报效祖国”,为人民做有益的工作,这就是杨通方学长给我们教育事业留下的不可磨灭的业绩,使我们永志难忘。杨先生对人对工作总是以热情、诚挚相待,他遇到逆境也能正确对待,从不气馁,坚信真理,坦诚自信。一次,我们接到《人民日报》送来的一篇著名的朝鲜短篇小说,对方准备在该报副刊上发表。我们接得此文后,委托杨先生执笔翻译。记得那时正是杨先生环境“最不顺利”的时刻,但是,杨先生却抛弃客观压力,排除心头烦事,以流畅的汉语很快译出。该篇小说刊登在《人民日报》副刊上。杨先生不管遇到多大风雨,从不说假话,不歪曲事实,不见机行事,毫无怨言,这正是他一颗爱国心的具体体现,也是我国真正知识分子的固有美德,他的这种作风与言行一直影响着下一代。

我和杨先生重新接触,那是在20世纪的90年代。1992年中韩建交,在我国外交史上展开了新的一页,而早在1991年,在杨通方先生主持下北大就成立了“北京大学韩国学研究中心”。从此,我国有了研究相隔数十年之久的韩国问题的科研单位。杨先生不顾年事已高,亲自率领各方研究人员,汇合各个有关学术单位开展了这一崭新课题的研究工作。据不完全统计,几年来共出版了五十多种中韩方面的译著和专著,每年还出版中国学者撰稿的论文集。这一时期北大韩国学研究中心举办了国际、国内学术讨论会达十余次,规模最大的是“第五届亚太地区韩国学国际学术会议”,与会者来自美国、加拿大、日本、韩国等十几个国家,代表一百三十余人,发表论文九十余篇。

在中韩两国互派学者访问方面,年年都有安排,通过北大韩国学研究中心或为之牵线搭桥,实现人员交换为数很多。北大的历史系、中文系等都同韩国的相应大学互派教授讲学,韩国汉城国家级图书馆奎章阁与北大图书馆建立了人员来往与图书资料交换。北大韩国学研究中心的创立,是我国全面开展对韩国的了解与研究的良好开端。继北大之后,浙江大学、复旦大学、山东大学、辽宁大学等多所大学如雨后春笋,均分别成立了相应组织,有力地推动了国内的学术团体、大学院校开展这一领域的工作,并为之提供了诸多的有益依据。同时,通过人员交流加强了中韩两国人民之间的了解,使中韩两国人民数千年的友好关系得到新的发展。

杨通方学长主持北大韩国学研究中心工作有十余年,他在中韩两国处于历史时刻的这一段宝贵的时间里,可以说不遗余力,全力倾注,开拓新领域。除了大量的组织工作外,他立足于改善中韩睦邻关系的国策,为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我国在国际关系中影响力不断的提高,以古论今,以今求后,大量引用中韩两国历史史料撰写《论汉字文化圈》等论文,并发表中韩文化交流史方面的重要论述。

杨通方先生是我国研究韩国学的奠基人之一,他为祖国一生辛勤的工作是会被后人记在心上的。他在韩国的影响也是很大的,2001年韩国授予杨通方教授名誉博士学位,这是韩方首次授予中国学者学位称号。杨先生不尚空论,在和我的多次谈话中,强调做任何工作都要“一步一个脚印、实事求是”,这句话看似普通,但在他的一生中能始终做到这一点却是不容易的。任凭一时狂风骤雨,或荆棘丛生,他始终如一地热爱祖国、热爱工作,并以诚挚的心态,一步一个脚印地踏着中国学者应走的道路走

下去。

五十余年与杨通方学长相交,我所得到的教诲与启迪是很多的。今天是杨先生八十华诞,相信我们的年华也会是与时俱进的,祖国的锦绣河山展现在我们眼前,东方的太阳冉冉升起在地平线上,而夕阳又红似火,在杨通方先生八十寿诞之际,我在这里热诚地祝贺杨通方先生健康长寿!

(作者为北京大学韩国学研究中心教授)

沧桑历练,老当益壮

夏应元

50年前,我在周一良老师指导下治日本史,并曾讲授亚洲史。改革开放之后,又着手研究中日关系史。这一领域,由于其外延牵涉到与其他国家的关系,特别是中日韩成犄角之势,往往关系密切,遂成研究者之间进行学术切磋的机缘。而近20年来,我在中韩(朝)关系史方面,得益最深的,则是来自杨通方先生。

杨先生早年毕业于南京东方语专的韩语系,后又去汉城大学攻读韩语及历史。1951年回国,来北大东方语言学系任教。但我与杨先生开始熟悉,则是在改革开放后学术再现朝天之际。彼此都是沧桑历练之人,若干事情自然历历在目,难以忘怀。

第一件事:在80年代,周一良先生发起编纂《中外文化交流史》。这是在这一领域空前的大部头研究。周先生邀请的撰稿人,几乎都是当代国内一流专家。当时杨先生受周先生之邀,撰写中韩文化交流史部分。而我则在恩师严命之下,屡辞未成,勉力完成了中日文化交流史部分。在撰述中外文化交流史的过程中,可以说是有幸与通方兄的第一次合作。

那时,我刚从日本学术访问归来。我在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期间,结识了韩国访问学者、韩国唐史研究会会长卞麟锡先生。不久,卞先生来京访问。他也是杨先生的老朋友,于是我们得以再度欢聚一堂,相与酬酢,更加敦睦了彼此的友谊。

杨先生是中国的韩国史领域的开创者和奠基人,其开创之功为学术界所公认。不仅如此,他的为人又极其亲切热情、敦厚朴实,凡有求教,无不倾囊相授。记得,那年杨先生的恩师、韩国学术界的泰斗,德高望重的金俊烨先生来北大访问。杨先生十分热情地主动把作为后辈的我介绍给金先生。此一学术之缘,使我得受前辈教益,收获良多。

后来,经陈玉龙先生提议,组织杨先生和我,以及范毓周先生四人,分工撰写《汉文化论纲——兼述中朝、中日、中越文化交流》一书。在大家的通力合作之下,得以顺利完成。在杨先生认识的韩国大宇财团的资助之下,得以顺利出版,并且获得了国家教委第二届高校出版社优秀著作奖。其中,杨先生功不可没。这是我有幸与杨先生的第二次合作。

前几年,我曾与杨先生谈起,设想共同在中国考察中韩文化交流遗址,此议深得

杨先生的赞同。可惜因我去了日本，至今未能如愿，深以为憾。

最后，当通方兄八旬大寿之际，让我衷心祝愿他健康长寿，老当益壮，为发展中国的韩国学作出更大的贡献。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教授）

热泪映丹心

何芳川

杨老师八十初度，精神矍铄。

从相识到相知，十数寒暑，匆匆而过。

印象最深的，是在燕南园杨老师家中的一次谈心。那天，我到老师家拜望，讨论完了有关韩国研究中心的工作，谈话渐入深境。窗外树影婆娑，清茶一杯在手，正是谈心时候。

不觉聊到家父。我向杨老师禀报了家父解放后自美归国效力，“文革”中却被打成“美国战略情报特务”与“国民党 CC 大特务”关进“牛棚”，苦熬岁月。我只顾埋头诉说当时自己的痛苦心境，忽然感到屋内是那么静那么静，一直不时笑语插话的杨老师那边，没了声音。

猛抬头，只见杨老师泪流满面，用一块大毛巾使劲在脸上擦来擦去；擦来擦去，仍然是满面泪流。

心中“咯噔”一下。终于明白了许多。

终于明白了，杨老师的委屈。一个爱国知识分子，数十年横遭猜疑的委屈；

终于明白了，杨老师“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的心境。在年近古稀的时候，拼老命工作，撰写中朝友好历史的论著；努力创办北大韩国研究中心，促进中韩学术交流；

终于明白了，杨老师以那么大的爱心、关心帮助后辈学者；特别是我本人在学校各种工作中都得到老师的大力热诚的支持，受益良多。

那是因为，杨老师有一颗爱国、报国的赤子之心。

这颗中国知识分子的爱国、报国之心，黄金、白金、珠宝、钻石，哪样能量出它的价值？！

丹心无价。

（作者为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亚太研究院院长）

良师启蒙终生受益

宣德五

在我书桌的玻璃板底下压着一张彩照，这张照片拍摄了北京大学韩国学研究中心主任杨通方教授赴韩国高丽大学接受该校授予的名誉博士学位的真实场景。蒙杨先生不弃，他特意送给我一张。当我打开信封，一眼看到杨先生这张照片时，我不禁感慨万千，心潮起伏，追忆往事，50年前在沙滩红楼开始学习朝鲜语的情景，又栩栩如生地浮现在我的眼前。

1951年秋，我奉调由上海圣约翰大学新闻系转到北京大学东方语言文学系学习。当时正值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运动时期，出于爱国热忱，我选学了朝鲜语。那时还没有进行院系调整，北大仍在沙滩红楼，我们的教室就在红楼二层。朝鲜语科那时有三位教师，两位是朝侨，还有一位就是在我国东方语专韩语科毕业，又去了韩国汉城大学校文理科大学史学科留学归国的杨通方先生。记得我们一年级就是由一位朝侨马超群先生和杨先生共同执教的，在学完了朝文40个字母发音和拼读后，即进入了短句短文学习。那位马先生的母语虽是朝鲜语，但他并不善于从外语这个角度来讲授朝鲜语。我们这些学生只能是鹦鹉学舌似的跟着他练习发音，朗读短句。只有等到杨先生上课时，他才给我们分析句子的构成，讲解句子的含义。作为成人学习外语，这是不可缺少的一步。尽管杨先生当时是初登讲坛，人也很年轻，但他的讲课还是得到了我们班同学的好评。给我们印象最深的是，杨先生讲课认真负责，50分钟一个课时，没有一句是题外话。时隔50年，当我们班老同学聚首一堂，回忆当年红楼的学习生活时，还是交口称道杨先生的讲课，异口同声地说在我们学习、掌握朝鲜语这一工具的过程中，杨先生作为启蒙老师，为我们引路，带我们入门之功实不可没。

但是杨先生走过的教学、科研道路并不平坦。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他长期身处逆境。直到通过拨乱反正，我国进入改革开放时期，随着中韩关系的逐步改善，特别是两国建交前夕和建交以后，杨先生的学术生涯才又焕发了青春。这首先具体体现在他的学术研究成果方面。这段时期，在中韩历史关系这一学科领域，他发表了一系列论著，如《先秦至后唐时期中国与新罗的关系》、《中外文化交流史》（合著）、《汉文化论纲》（合著）、《汉唐时期中国与百济的关系》等。特别是《汉文化论纲》，杨先生在第三章中系统论述了各个历史时期中朝文化交流的具体历程，此书获得了中国1991—1994年高等学校优秀著作奖。杨先生不仅自己撰写著作，而且还凭借他和韩国知名学者金俊烨教授的深厚的师生情谊，在金教授的关心和支持下，创办了北京大学韩国学韩国学研究中心，并亲任中心主任，有力地推动了我国韩国学的学术研究，为中韩学术文化交流搭起了一座坚实的桥梁。

在这方面,我个人有着切身的体会。

我从1959年自北大东语系研究生毕业后,直至1979年,一直都未离开过朝鲜语教学岗位(“文革”停课期间除外),主要担任精读课和语法课这两门课程。在近20年的教学实践中,我结合自己在讲授朝鲜语时所遇到的一些重点问题和学生们在学习中所遇到的一些难题,编写了《朝鲜语基础语法》,此书于1978年完成定稿,并打印成教材(油印稿)发给学生及有关一些单位作参考,获得好评。当时我所在单位曾与一些出版社联系出版事宜,但出版社出于经济效益的考虑,都无意接受。我一气之下将油印稿本压在我书桌的抽屉内,从此书稿在抽屉里一躺就是14年。1992年,杨先生在中心韩国学丛书编委会上了解到这一情况,通过编委会,决定资助出版此书,遂使这一著作得以问世,于1994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成为国内各大学韩语专业采用的主要教材之一,1997年又再次重印,并于1999年获韩国东崇学术奖。我想,若非杨先生过问此事,此书稿恐怕至今还沉睡在抽屉里,无法面世。作为中心韩国学丛书的主编,杨先生积极组织文、史、哲、政、经等各个领域的专家学者撰写有关韩国学的专著,并争取外援资助,予以出版。许多著作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在国内外引起了极大的反响。若不是杨先生创造了这些有利条件,不少课题的研究根本就不可能上马,即便是上了马,取得了研究成果,恐怕也会是命途多舛,最终摆脱不了被打入冷宫的命运。

中心在杨先生主持下,还组织国内学者赴韩访问,进行学术交流,促进了中韩学者的友好往来和学术联系。1993年9月,我就和沈仪琳、赵习两位教授一起,被派往韩国作为时一个月的学术访问。在此期间,我们拜见了韩国社会科学院理事长金俊烨教授,访问了韩国精神文化研究院。我和赵习同志还访问了韩国国立国语研究院,在汉城大学和高丽大学的国语国文学科作了有关韩国语的学术讲演。通过一系列的活动,我们还结识了汉城大学、高丽大学、成均馆大学、庆熙大学等知名大学的许多著名韩国语学者和教授,建立起两国韩语学者的深厚友谊。

在杨先生领导下,中心还精心组织了多次韩国学国际学术讨论会。我有幸被邀出席过几次会议,聆听了许多颇具学术价值的讲演和讨论发言,拓宽了学术视野,实在是受益匪浅。这些高质量的论文还都被先后刊登在杨先生主编的《韩国学论文集》上,作为中心的学报,《韩国学论文集》被认为是国内韩国学学界最有影响的学术刊物之一。

当然,杨先生作为国内最具影响的韩国学学者之一,他不仅致力于北京大学韩国学研究中心的学术活动,而且还超越这一范围,关心国内外整个韩国学学术界的学术研究活动和发展动向。

杨先生是狷介之士,不善言辞,谦虚朴实,平易近人。他虽是我们的老师,但在平时接触中却像对待朋友一样,倾听意见,乐于助人。2000年,我与我单位的一位专家合作,把训民正音创制的渊源问题列入我们的研究课题。此课题虽与中心的研究课题无关,但当我们提出申请赴韩半年进行研究时,杨先生从推动韩国学学术研究的角度出发,仍欣然同意,把我们推荐给韩国国际交流财团。虽然后来因故未能成行,但是杨先生的支持和鼓励,令我们十分感动,我也因此增强了信心,坚持与那位专家通力合作,终于完成了这一课题的研究。2003年,我计划将我发表过的论文加以精选,